學習時報

2010年12月6日 第565期

STUDY TIMES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 报名题字:江泽民

周一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3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邮发代号:1—267

中欧美学术论坛在中央党校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宫秀川）12月2—3日，由中共中央党校、意大利阿斯平研究所和美国阿斯平研究所联合主办，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意中基金会协办的中欧美学术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治理：挑战与展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全球治理：理念、利益与责任” “全球经济及后危机时代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环境与能源安全”和“国际安全：传统的冲突和新的风险”四大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多项共识。

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欧美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根本在于三者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欧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在扩大，相互需求也在增加，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愿望十分强烈，战略合作的前景广阔。中欧美应坚持相互尊重、优势互补、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丰富合作内涵，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中欧美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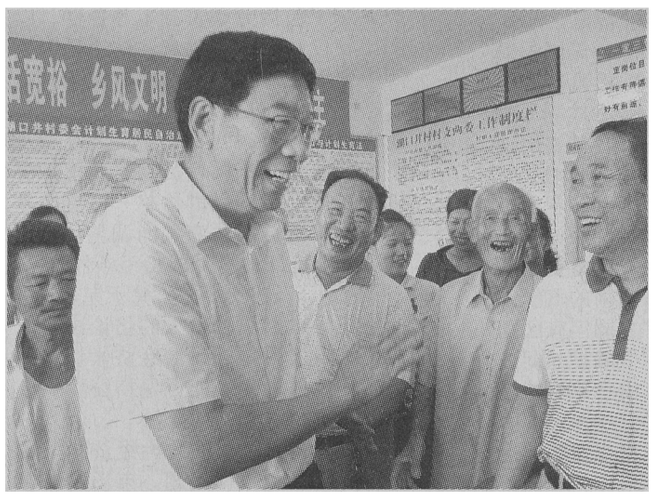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主持开幕式并在闭幕式上致辞，副校长李书磊主持闭幕式。教育长张伯里，原副校长李君如，校委委员、培训部主任徐伟新，校委委员、哲学教研部主任贾高建，校委委员、办公厅主任罗宗毅，校委委员、进修部主任黄宪起，校委委员、组织部部长赵长茂出席了会议。

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意大利阿斯平研究所主席朱里奥·特雷蒙蒂，意大利前副总理、前外交部部长詹尼·德米凯利斯，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美国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美国阿斯平研究所联合主席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英国上议院议员、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等来自8个国家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徐守盛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湖南视察时，特别强调了城乡统筹发展问题，这对湖南这样的农业大省来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指导意义。从我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目前最紧迫、最现实的任务就是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



徐守盛省长在湖南邵阳市农村与村民们“唠家常”

首先，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要求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是国家公民，为中国革命、改革、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村长期支撑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但目前农村的整体面貌和农民的生活状况还没有得到充分改善，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湖南作为农业大省、鱼米之乡，稻米、生猪等大宗农产品产量在全国位居前列，在计划经济时期就为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省农业得到长足发展，粮食总产突破600亿斤，创历史新高，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例如，2006—2009年，我省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为7115元、8390元、9308元和10174元，差距呈逐步拉大的态势。这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相符合，必须加以重视，从制度安排、政策支持等方面加以解决。

其次，持续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要求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现阶段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需要从城乡统筹的角度加以分析。比如，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拉动，而我省仍然属投资拉动型经济，消费拉力虽然有所增强，但总体水平还不高，经济外向度就更低。从投资潜力看，目前全省在建的高速公路有3000多公里，在以城市为主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后，下一步的投资重点无疑要转向农村。从消费看，现在城市家庭的消费品基本趋于饱和，扩大农村消费的潜力远大于城市。可以说，农村将是宏观经济发展提速的重要引擎，这就要求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统筹城乡发展上来。再如，改善民生方面，上学难、看病贵、社会保障等问题在城市解决得相对较好，而农村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回过头来看，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始终伴随着农村的贡献和农民的奉献，城市的宽马路、大广场，都以减少农民的良田为代价，但农民真正得到的却不多，改善农村民生的任务还相当繁重。目前，全国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以上，我省也在3000美元左右，城镇化与工业化加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快速推进，已经有能力把工作重心和重点转移到农村和城乡统筹上来。

第三，湖南作为农业大省的基本省情，要求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我省经济总量已连续两年进入全国前10位，跨入了“万亿元俱乐部”，但是人均水平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湖南作为农业大省的基本省情决定的。我省实现从农业大省向经济强省转变，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从发展的角度认识农业大省的省情，明确这个“大”主要“大”在哪些方面。一是“大”在农业人口多。全省农村居民达到3900多万人，占总人口将近57%，城镇化水平只有43%，比全国低3个多百分点。二是“大”在第一产业比重高。我省三次产业结构比是15.2 43.9 40.9，第一产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6个百分点，排全国第5位。在中部六省中，我省第一产业比重最高，第二产业占的比重最低。三是“大”在农村区域广。全省城区建成面积约为962平方公里，仅占全省面积的0.45%。四是“大”在以农为业的农民多。去年末全省从业人员3935万人，其中1693万是农业从业人员，占43%。五是“大”在农村的发展任务重。特别是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需要付出长期的、艰巨的努力。这一基本省情，决定了农业农村的基础地位始终不可动摇，即使将来经济发展了，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三农”工作仍是重中之重，不能有丝毫放松，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着力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形态，努力确保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总的来说，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五个方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一是着力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改变过去把农村发展资源“统”到城市发展盘子中的做法，努力创造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信贷、用地、人才 技术等要素资源都往城市走，就谈不上城市支持乡村，也谈不上工业反哺农业。目前的经济发展不论是从布局还是从结果来看，着眼点和落脚点大都放在城市，放在第二、三产业，基本上是以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为中心，来谋划一个区域或一个时期的发展。这样就使绝大部分资源要素在加速向大中城市集中，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也就难以避免。县域不强首在产业，必须少考虑往城市“统”，多考虑向农村“筹”，把资源要素更多地向农村倾斜，以农村产业发展和资源增值为基础，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城市资本、技术力量和农村资源优势相结合，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产业就在于基础设施。例如，高速公路连接的主要是城市，相对而言乡村就有被割裂的倾向，城际交通越便捷，发展滞后的农村可能越会被城市甩开，资源、人才 资金等可能加剧离农村而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致力于弥补城乡建设方面的差距，在一个个点上取得成效和经验后，再从面上铺开，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带来大效应、大效益。首先，要抓好农村建设的规划。目前在城乡统筹规划上，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很不相符。很多山村的老房子与新房子混杂在一起，又不相对集中，导致公共服务难以覆盖。规划是建设的基础，从大城市、中心城区、中心城镇再到中心村，都要有合理的先期规划。当前要突出抓好村庄建设规划的制定，规划出来以后，要广泛吸纳群众的意见，确保住宅建设位置适当，有利于水、电、气、通讯等设施的集中配套。我省山地、丘陵多，要想户户通公路很不现实，也浪费资源，要从省情实际出发，大力推行行政村通公路的模式。特别是还有一些农户仍散居在不适宜居住的地方，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引导农民适当集中，逐步改变目前农村房屋布局散乱的状况。其次，要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通过抓好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实施，促进城镇功能向农村、农户延伸和覆盖，让农民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特别要在大力培育中心城市的同时，重点建设好县城和中心城镇，均衡配置城乡公共服务硬件设施，推动周边乡村的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设施与县城、中心城镇对接，抓好农田道路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最后，要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农村的建设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不能动不动就宽马路、大绿化带。湖南是种什么长什么的地方，耕作条件好，更要注意给子孙后代多留些土地，多留些发展的空间。要多利用山丘地和坡地，因地制宜建设新农村，防止城市、乡村同质化，努力建设一个田园风光与城市文明水乳交融的新农村。

三是着力促进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去年我省农村外出务工人数为1200万左右，还有56%的适龄农村劳力停留在农村，大约超过现阶段农业发展实际需要20个百分点。过量适龄劳动人口被固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说明农业、农村、农民目前最紧迫、最突出、最重大的问题，还是就业问题。要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坚持就近就业和异地转移就业相结合，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营造城乡平等的就业环境，引导农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促进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变。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育返乡创业的典型，以创业带动就业。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还必须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要做好做足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文章，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大力抓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多渠道增加收入。比如，湖南四季分明，雨量丰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蔬菜不仅没有形成产业，而且保障省内自给也比较困难。要统筹谋划，正确引导蔬菜产业发展，把蔬菜产业做大。这既是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农民就业增收的需要。要围绕粮食、生猪、油料、柑橘、茶叶、蔬菜、棉花、竹木、水产等农业主导产业，重点发展龙头企业、引导“能人大户” 培育经纪人和加强配套服务，加快形成能有效带动农民就业致富的产业链。

四是着力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济快速增长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同步，将直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在，总结成绩时讲总量的多，人均的概念不强。老百姓关心的不是GDP，而是就业、就学、就医等实际问题。我们要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把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完全纳入到总体发展战略、规划、项目，促进全省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要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为突破口，加大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交通、通信等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促进城乡社保、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文化公共服务等协调发展。

五是着力促进城乡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我们追求的GDP，是绿色GDP，是惠民的GDP，是有效益的GDP，是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GDP。现在有的地方存在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的情况，而农业农村自身的面源污染也有加剧的态势，不少地方“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化”，脏乱差问题比较突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创新生态保护机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积极筹措城乡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同步加强城乡生态环境建设。要大力发展农村清洁能源和绿色产业，特别要把乡村旅游产业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结合新农村建设，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夯实发展田园观光、休闲农业和绿色无公害农业的基础，吸引游客从城市向农村扩散，增加游客在农村的体验机会和滞留时间，引导游客扩大在农村的消费，通过拓展农业功能，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和产品附加值，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关注点

宏观调控要注重科学性和预见性

□杨英杰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为防范各类潜在风险，避免经济大的起落，必须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没有与中文“宏观调控”相对应的经济学术语。就中文语境来说，“宏观调控”其意相当于西语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和。

究其本义，“宏观调控”并不是指政府对市场的简单干预，而是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相机抉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自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诞生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纠缠不清，颇为复杂。概而言之，大萧条之前，以自由放任为第一要义的古典经济学一统天下；大萧条之后，特别是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从实践上成功地配合了凯恩斯的理论。自此，以凯恩斯为代表的青睐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以斯密为代表的钟情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两派之间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似乎不分伯仲。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为两派的论争提供了极佳的素材。

一方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市场过于放任造成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证明，并以此论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须更加强化政府的干预而限制市场的自发机制。另一方则强调，此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对市场长期实行不当干预的结果，是不恰当的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使得价格信号长期被扭曲、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作出的强制平衡。

眼下，金融危机造成的动荡正慢慢平复下来，人们也能够更加理性地对此次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加以反思。事实恰恰表明，正是由于美联储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政府以“居者有其屋”为目标干预房地产市场，致使房地产市场泡沫愈来愈大，风险愈积愈重，从而使美国成为此次金融风暴的策源地。

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恰当设计，政府的时间偏好更强于市场中的一般参与者这一特点会导致政策的短期化，放眼全球，概莫能外。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央行纷纷释放流动性，量化宽松政策一轮未了 一波又至。从2001年1月美联储连续下调利率，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引爆次贷危机，真是受祸之速，过于旋踵。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次生灾害，我国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及时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急就章式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比如物价水平的不断上涨，房地产市场总体价格水平仍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甚至可以说，已经对顺利实现 “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目标造成影响。但究其根源，就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宽松”所导致的货币超发。我们同美国进行比较，截至2010年9月底，中国M2余额已经高出同期美国M2余额的20%，而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仅是美国的1/3。我国经济体内大量缓慢沉积的货币如笼中之虎，一有风吹草动，势必首先以物价上涨的形态威胁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

货币多了 货币的价格——利率便会走低，从而向投资者传出一个信号，即资金使用成本降低了。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扭曲的价格信号所导致的投资决定是形成商业周期的主要原因。奥地利经济学派凭着一整套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成了唯一预测到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的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银行信贷的大规模扩张所导致的低利率会诱使投资者投资于生产周期更长、更加资本密集型的项目，从而减少消费品的生产。由于没有新的储蓄来弥补增长的投资，所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最终也会传导并带动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除非非市场因素强行以信贷方式持续不断注入资金才能维持长周期亏损项目的运营，但其结果必将是物价不断上涨，最终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以奥地利学派理论衡量中国当下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能不令人警醒。我们应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实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如在调整支出结构的基础上保持总量的平衡，适度减税，采取提高利率等价格型工具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等。政策上松紧搭配，避免急刹车，努力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

宏观调控如同对弈，不能看一步走一步，应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破除特别是假借“宏观调控”之名而生存的行政性垄断，不断完善形成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和重要商品资料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在深化改革中推进经济转轨，促进社会转型，为实现“十二五”规划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从通胀看提高居民收入的迫切性

□梁 朋

今年7月以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快，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今年7—10月CPI逐月上升，分别为3.3%、3.5%、3.6%和4.4%。11月份CPI将可能继续走高，政府承诺要将2010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控制在3%左右的目标有可能被突破。物价上涨的势头让老百姓绷紧了神经，也让政府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还是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在10%左右，出现4%左右的通货膨胀，应该还算是可以接受的正常现象。但是目前比4%多一点的通胀，就引起老百姓这么大的不安甚至是恐慌，难道是中国老百姓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特别差吗？恐怕不是。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不是物价太高，而是与物价升幅相比，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太慢。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除了工资不涨，其他什么都涨”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从国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看，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呈现逐年降低的态势。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3年过去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仅不见提高，反而呈现继续下降之势，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的43%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逐步提高”到“努力提高” 虽然只是两字之差，但却能明显感受到其紧迫性。

其次，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的GDP从99214.6亿元增长到335353亿元，是以前的3.38倍；政府财政收入从13395亿元增长到68477亿元，是以前的5.11倍；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从6280元增长到17175元，是以前的2.7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5153元，是以前的2.28倍。可见，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要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正是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导致了对物价上涨的极度敏感。

第三，由于居民收入增长存在不均衡性，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要远高于一般工薪阶层、农民工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使得对通货膨胀特别是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上涨最敏感的人民群众，其收入增长幅度反而是最小，这样必然导致他们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大幅下降，只要物价稍有风吹草动，人们的恐慌性情绪就难以避免。

因此，从短期看为了稳定物价上涨较快的势头，政府出台各种措施，甚至动用“限价令”都是必要的。但从长期看，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需进一步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各种价格关系。同时，通过长期人为压低农副产品价格换取物价稳定的做法，恐怕也难以继续。从长远看，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控制价格，而是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同步。通过提高收入，既增强了居民的通胀承受能力，使广大老百姓切实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为宏观调控政策提供更大的回旋空间，为我国的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